

年代,他用手中的如椽史笔,支撑起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学术骨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发展的浪潮中,他是学术争鸣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①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他的成果遭否定,灵魂受冲击,精神被摧残;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在书面发言中热情呼唤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科学事业的新的腾飞,“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郭沫若逝世已近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如何,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心血结晶、研究成果,可继承,可超越,可质疑,可批判,但不可被漠视,被遗忘,被歪曲,被糟践。在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通常被划分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学科来看,需要明确以下几点。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不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经受了各种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且在理论上获得了深入的开拓和发掘,并且深刻影响到包括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实践,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首先需要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建构,其中,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流派,并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以往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概论性描述。其中既有两派说,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又有三派说,即信古派、疑古派和释古派;还有五派说,即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和史建学派。^②现在看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完全对立起来,依照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所

^① 郭沫若发起的关于曹操、武则天翻案的讨论,关于《再生缘》的校正及作者考证以及《兰亭序》原作者是否为王羲之的讨论,都形成了当时的学术热点,成为史学繁荣的表征。

^② 详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谓“资产阶级史学”,或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方法和史料学分割开来,仅仅视为唯物史观在历史学领域的具体运用,都缺乏应有的事实基础,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排斥既往文明和科学发展的成果,我们叙述和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兼顾中国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把这三种史学流派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最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并且伴随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政治和文化诉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因应时代需要的一种学术体系建构,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国革命和建设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所以,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还需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深刻的认识。

从学术主体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20世纪末期,已经涌现出前后接力、各有建树的四代学者。^①第一代学者诞生于二三十年代,包括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他们投身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较早地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活跃于三四十年代,包括邓初民、华岗、邓拓、李平心、何干之、胡绳、杜国庠、嵇文甫、李亚农、白寿彝、吴泽、尹达等人,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过程中崭露头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中坚力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第三代学者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主导地位之后,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跻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列,经受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在历史学领域奋起直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代学者起步于七八十年代,伴随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跨入历史学的殿堂,抱持改革意识来重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依凭全球视野来构筑中国特色史学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

此外,从学术对象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向内深化、向外拓展的过程,从具体的历史研究深化到史学理论研究,从最初的中国史研究拓展到世界史研究。在这个深化和拓展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涵不断丰富。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构建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包含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现行的13个学科门类中,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中国文化的推陈出新,中国史学实现了代际更替。中

^① 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体的研究,迄今所见大多是个体研究,群体研究则比较缺乏。戴逸论及20世纪中国史学,认为这一百年中国史学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产生了四代史学家: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主要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第三代史学家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第四代史学家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详见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载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红岩谈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谱系,认为迄今已经出现了三个方阵:第一方阵主要是“马列五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第二方阵包括一大批学者,如李达、邓初民、华岗、邓拓、李平心、胡绳、尚钺、嵇文甫、杜国庠、李亚农、赵纪彬、白寿彝等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方阵出道于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李红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谱系》。http://jds.cass.cn[2013-12-11].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与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三足鼎立中,逐渐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从较模糊地触及人类社会历史的轮廓,到逐步构筑起一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知体系;从只有少数史学家发端,到日渐成长为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经历了一段创新发展的路程。

1919—193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传统史学已经没落、近代史学方兴未艾之际,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时期撰写的史学论著,大都是借用一些历史事实来为唯物史观作注释,是为论证中国革命问题而回顾历史,或者依据历史进行革命宣传,几乎没有脱离政治斗争的支配。至于少数带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也只是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在这个时期里,历史研究的主体基本上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他们都是为了研究革命理论以推动革命实践而涉足于史学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以历史研究为专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还没有形成。

1930—194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论战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充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一批史学家的努力开拓下,初步构筑起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即对中国社会发展史从原始公社时期,经过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的宏观把握。在研究方法上,把历史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相结合,从对各种考古文物的分析和甲骨金文的解释,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新途径。特别是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已经不再是某个人的学术取向,而成为一批史学家的共同追求,由此初步形成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1940—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门较系统的学问,伴随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而被推及全党,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二代学者聚集在延安和重庆,编撰中国通史、探讨先秦诸子和中国思想史,论述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在历史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以往有较大的进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开拓的结果,已经构筑起一个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从而增强了它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战的力量,为它在全国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做好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1949—196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一枝独秀的学术局面。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历史,逐渐步入世界历史的领域,从而拓展了历史学的范围。历史文献整理、历史知识普及和文物考古工作同步进行,共同推动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然而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历史学领域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造成一定的影响。

1966—197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挫折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政治挂帅替代科学研究,阶级分析替代理性分析,大批判替代思想交流,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一度被迫关门,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遭受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或是被迫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及所谓“批儒评法”活动,历史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困境。

1976—198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时期。在新的环境下,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实行,史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对一些曾经热议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加深了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世界历史受到应有的重视,不再是各个国家、地区历史的拼凑,而是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史学理论研究备受关注,怎样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科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要目标。这一阶段发表和出版的史学论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阶段,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达到了新的高度。

1989—199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时期。因为注重新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新史料被发掘和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不少研究的新亮点,从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辩到历史创造者的再认识,从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讨论到有关“封建社会”的争论,从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讨到对革命史范式的反思,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到国学研究的兴起,注重历史研究的开放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和考古学体系的新探索,都推动了中国史学多元化的进程。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而呈现的显著创新性,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学术支撑的实践性,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论辩中显示的强烈批判性,以及较之其他史学形态而具有的学科进步性。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成为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科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进展,历史科学在其中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人类社会得到了一次规律性的总结。20世纪中期以前,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藩篱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脱颖而出。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获得了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历程。因为史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经问世,就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还只是个别人的学术取向,经过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变成一批史学家的共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史学形态。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写作了一批经典论著,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这些著作以其显著的学术创新性,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首先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把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二是把它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反过来根据中国历史实际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认定马克思主义对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指导意义,这有力地支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从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出发,放眼国际历史科学的大背景,深入探讨历史学的理论架构,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鉴戒,这都充分彰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意义。不过,历史学有它自身的学术特点,如果一味地服务于现实需要,也会扭曲历史学的前进方向,使之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政治干扰严重破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

学流派的论辩中,表现出强烈的学术批判性。从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以“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到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对胡适宣扬的“国故整理”的批判;从五六十年代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从80年代中期对“史学危机”的争论,到90年代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有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有的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尊严,但也有有的伤害了史学研究和史学家,有的搞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所以需要具体地作出适当的评价。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也有过激烈的争议和论辩,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和八九十年代对这些问题的再讨论。这种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论辩,体现出历史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较之其他史学形态具有先进性,这集中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把握和理论阐释上。一般说来,中国传统史学偏重于历史编纂和文献整理,近代史学倡导“国故整理”,信奉“史学即史料学”的宗旨,运用“疑古辨伪”的方法,说明历史真相及其因果关系。与这两者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行理论阐释,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考察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历史认识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重视历史研究,而且重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力图把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结合起来,以提高中国史学的整体水平。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撰著方法

整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奠基、开拓到形成,再从发展、挫折到复兴、转型,经历了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在每个发展阶段中,中国史学界都关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总结和检讨,也有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质疑和责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阶段、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成就等问题,都得到深入细致的探讨,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论著。这些研究表明,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者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或是侧重于历史叙述,或是侧重于学术批评;或是侧重于主体考察,或是侧重于问题解析。这种各有侧重的学术史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窗口,需要高度重视。然依笔者之见,要想撰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兼顾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历史思想及其相互关系。

历史学家编织着历史著作,阐发着历史思想;历史著作蕴含着历史思想,映照历史学家;历史思想衬托着历史学家,支撑着历史著作。只有充分关注历史学家,才能避免“见书不见人”的毛病;只有反复咀嚼历史著作,才能避免“闻香不知味”的疏漏;只有深入探析历史思想,才能避免“有形而无神”的缺憾。我们只有兼顾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历史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真正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写成一部既有血肉和筋骨、更有灵魂的学术专史。

在具体编撰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实际,尽可能地描绘历史真相;必须紧扣学术主线,尽可能地勾勒学术轨迹。我们必须保持全球视野,强调国家意识,做到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我们既要关注群体合作,更要重视个人论著;既要表彰专精之作,更要凸显博通之学。我们要像司马迁那样“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亦如后人评价司马迁那样“不溢美,不隐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领域,争取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